

“灰皮书”、“黄皮书”在知识青年 “上山下乡”前后的流传及其影响

郑瑞君

(首都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089)

摘要:“灰皮书”、“黄皮书”是坊间对我国1960年代初开始出版的一批约三百多种“内部发行”图书的统称,这个出版活动持续近二十年,成为我国当代出版史上一个奇特现象。“灰皮书”、“黄皮书”的出版背景是配合国际“反修”斗争,为党内干部教育提供“反面教材”。“文革”开始后,这些图书以各种方式流传开来,给当时渴望读书的青少年以极大的思想启发,引导他们联系社会实际思考国家未来发展,这些思考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向全国延伸,逐渐汇聚成为后来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导。

关键词:“灰皮书”;“黄皮书”;“地下读书”;思想启蒙

中图分类号:K 2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587(2015)02-0022-05

DOI:10.13763/j.cnki.jhebnu.psse.2015.02.004

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中苏两党在时代特征、帝国主义性质、战争与和平等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的认识分歧逐渐拉大,中共中央决定批判国际共运中的“现代修正主义”。为了配合这场声势浩大的国际“反修”政治斗争,我国出版了一大批“内部书”,内容多是所谓新老“修正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自第二国际以来关于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以及欧美政要谈论战争与和平等问题的言论等。其中的若干种图书所涉及的内容,当时认为极其敏感,出版时封面封底统一采用了灰色纸,此外再没有其它装饰,被称为“灰皮书”^[1],另一部分内容相对不是特别敏感的图书,出版时使用了黄色纸做封面,被称为“黄皮书”^①。同时,为批判修正主义文艺思潮、资产阶级人道主义和人性论,一批二战后苏联作家创作的描写残酷、血腥战争的小说、诗歌、剧本等也以“黄皮书”的形式出版,供研究批判使用。这些书都采用“内部发行”方式,“文革”前,只有达到一定行政级别的党内中高级干部、较为知名的高级知识分子经过批准才可以在指定的“内部书店”购买^②。“文革”爆发后,这些书以各种方式流传开来,许多青年学生因

为阅读了这些书而对“文革”产生疑虑。这种疑虑渐渐衍生成为一种潜在思潮,并随着“上山下乡”运动一起蔓延到天南地北,事实上成为消解“文革”理论与实践的社会思想潮流。考察“灰皮书”、“黄皮书”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前后的流传,可以看到,当初为“反修防修”而出版的这些“反面教材”,是怎样“异化”成了启发和引领那个特殊年代人们思想解放的“火种”,并借此观察到“文革”时期巨大政治浪潮覆盖下社会的细微变化。

1963—1964年前后是“灰皮书”、“黄皮书”的出版高峰,许多高中级干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都购买过这些书。“文革”爆发后,出于对“文革”的反思,或者只是为了打发时光,一部分中学生自发组合在一起传阅图书、交换习作、讨论问题,逐渐形成了后来所称的“地下读书”活动。所传阅的图书当然都是被当时官方意识形态所不允许的“禁书”,因而只在相互熟稔的同学、朋友之间的“小圈子”偷偷进行。整个“文革”时期各地都有类似情况。“灰皮书”、“黄皮书”正是伴随着这种“地下读书”活动大量流传起来。

收稿日期:2014-11-20

作者简介:郑瑞君(1963-),男,河北邯郸人,在读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现代史研究。

大体上看,“上山下乡”运动之前“灰皮书”、“黄皮书”的流传主要集中在中学生群体中的两部分人。

一是高中级干部家庭的子女。大约从1966年冬天开始,最早响应号召起来造反的出身于高中级干部家庭的“老红卫兵”^[2]们因为父母很快被打倒、关进“牛棚”而被“革命”的洪流冲垮,他们心中的愤懑、避退、恐惧、不满、抗争等情绪交织,本能开始怀疑“文革”,惺惺相惜的年轻心灵彼此靠近,他们或以同学关系、或借“大院”^③便利相互走动,在一起阅读家里的藏书、画画、听唱片是打发无聊和苦闷的好方式,探寻“为什么”和“怎么办”逐渐形成了自然的内驱力。家庭合法拥有“灰皮书”、“黄皮书”给他们带来安慰,一部分“灰皮书”揭示了斯大林体制的弊端,这在理论层面深深吸引着这些革命的“弃儿”,让他们“逍遥”、“颓废”、逃避、反叛或玩世不恭。^[3]著名心理学家徐浩渊的经历正是这样。徐浩渊的父亲徐迈进是著名的“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一直在新闻总署、中宣部担任领导,他爱书成癖,珍藏丰富。“文革”爆发时,正在人大附中读高一的徐浩渊是最早的“老红卫兵”。政治理想幻灭后,她和儿时的玩伴们整日聚在一起交换图书、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词等,渐渐形成了一个文艺活动小团体^[4](P218)。徐浩渊那时读过的“灰皮书”、“黄皮书”“都是从沙滩北街甲2号中宣部的院儿里拿出来”^[3]^[5](P51)。到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开始前,北京、上海、南京、重庆等城市存在许多这样的“沙龙”、“小组”^[2]^[6](P541)^[7]。

二是对理论问题有兴趣、来自普通家庭的中学生。“文革”爆发后,除了少数政治著作外,几乎所有中外人文社科读物都被禁售,新华书店一片萧然^[8](P179,183)。此后四五年,青少年“没有书看,知识贫乏,精神空虚,处在严重的饥荒之中”^[9](P81)。正是随着大批判、大辩论风潮,偏爱思考、彼此投缘的一部分中学生自发组成了大大小小的“沙龙”、“小组”^④,把彼此能够“寻”到的图书在各自的“小圈子”内传阅。固然,外国文艺方面的“禁书”包括“黄皮书”广受欢迎,而《资本论》、“灰皮书”这样内容比较严肃的政治、经济、哲学等理论著作在有着浓厚研究兴趣的学生中更受青睐。“文革”爆发时,学者魏光奇是北外附中的初三学生,出于理论研究的兴趣和对“血统论”的排斥,1967年春天他和同学结成“小圈子”,读书讨论,探寻“文革”的社会经济原因,还搞过一个庞大的研究计划^[10]。学者徐友渔“文革”初期在重庆也有类似的研究经历^[7]。

二

1968年底,“上山下乡”运动在全国铺开,城市的“地下读书”活动随着千百万“知识青年”跨越千山万水蔓延到了广阔农村。许多知青去农村的时候都带了整箱子的书,其中很多人文社科书都是“禁书”^[11](P195)^[12](P133)。澎湃青春对未知的天然兴趣和对社会现实的隐忧追寻交织在一起,使他们如饥似渴传阅包括“灰皮书”、“黄皮书”在内的各种“禁书”,由此经历了“思想上的反省与启蒙”^[13]。

当代知名思想者张木生有关“灰皮书”、“黄皮书”的记忆跨越“文革”爆发前后。张木生的父亲1940年代初期曾在重庆给周恩来、董必武当过秘书,母亲也是抗战前入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家里存有许多“灰皮书”、“黄皮书”,“经常是大人不读小孩读”。1965年,他已从人大附中初中毕业一年,有感于毛泽东批评学校“旧教育制度”的谈话,怀着当好“接班人”的强烈使命感,与同校高中毕业生、陈伯达的儿子陈小农等人一起去内蒙古插队。“文革”爆发,张木生把自家藏书、人大准备下放的老教师家的藏书、从已经封存的人大图书馆“找”来的书陆续搬到了插队的地方,“拼命读书,读马列和毛著,也读当时的禁书,包括当时供内部批判用的国际共运史上的一系列灰皮书”^[14](P284)。还走访大寨,办“讲习所”,经过本村偷偷实行承包制取得成效的实践,他在1968年20岁的时候写出了提倡“包产到户”这一颇具“修正主义”思想的三万字长文《中国农民问题学习——关于中国体制问题的研究》,在知青中广泛传抄,1969年前后形成影响全国知青“扎根”与否的大辩论。那时他就充满激情地放言“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15]。张木生的文章传开以后,同在内蒙古插队的突泉县学田公社北京知青组织了批判文章反驳张木生,分析“在意识形态方面,青年中存在着一种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表现在“对毛主席著作不感兴趣,大谈封资修小说《麦田里的守望者》(美国)、《往上爬》(英国)”^[14](P285)。

进入70年代,知青们“战天斗地”的豪情消退了,艰苦而单调的农村生活让他们倦怠,许多人就像候鸟似的来往于农村和城市,相对于集中生活的生产建设兵团,一些分散插队的知青点管理并不严格,农闲时节,许多知青一连几个月待在城市,父母都去了干校,他们呼朋唤友聚在一起,“沙龙”、“小组”等“小圈子”又变得活跃起来。那时徐浩渊经常从下乡

的河南回北京,继续与机关“大院”的朋友们开“沙龙”。她的沙龙里有“白洋淀诗派”的重要成员岳重,岳重的父亲是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编剧,家有四千册藏书,15岁的岳重就把《人·岁月·生活》、《往上爬》等“黄皮书”阅尽,笔记本上记满了“隆美尔的《战时日记》和加罗蒂的《人的远景》”^{[3][5](P51)}。干面胡同黄元的家也是当时北京有名的“沙龙”活动场所。1973年,到陕西插队几年后选调到宜川的报社记者站当记者的知青乔雪松的父亲恢复了工作,她借来父亲“从内部书店买到的黄皮书和灰皮书”,如饥似渴地阅读^{[12](P160)}。由上述情况可见,北京知青中传阅“灰皮书”、“黄皮书”情况是比较普遍的。

70年代前中期的“地下读书”活动除北京、上海、西安、贵阳、长沙、南宁等中心城市之外,一些农村的知青点和招工进厂的知青中也存在^[16]。1969年以后,300多名来自干部、知识分子家庭的北京知青陆续选择在“白洋淀”插队,那里特殊的地理、社会和人文环境,让饱受“文革”风暴煎熬的中学们略感沉静和安定。很多人以原来读书的中学为单位集聚在一起,在前路渺茫的生活中“疯狂读书”,所有的“禁书”都成了“狂热追逐的猎物”,在“经历了一个全面的压迫和苦难,我们的精神陷入了一种困惑”,于是“狂热地搜寻文革前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而最终使我们冲破十几年的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思想模式,得益于两本灰皮书的点拨,一本是托洛茨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一本是“德热拉斯的《新阶级》”,读了这两本书,“有关政治和社会的认识,我们终于摆脱了梦魇般的桎梏和愚昧”。那时,北京城里的“地下沙龙”流行的书在“白洋淀”都能找到,“借到或不管用什么手段弄一本好书,尤其是灰皮书、黄皮书和外国古典名著,我们会像一只饿急了狼逮着兔子,不但通宵达旦地一气读完,而且尽可能一句一句抄下来”^{[17](P11,209~210)},从古典神话到现代文艺理论,罗素、马斯洛、佛洛姆、萨特等等欧美思想家的理论像汨汨流淌的小河,滋润着近乎干涸的头脑。“白洋淀”大小几十个插队知青生活的村庄距离很近,青年人乘船或骑车相互“串庄”,外地也常有同学来探访,大家交换禁书、欣赏画作、讨论读书心得、朗诵诗作。传阅“灰皮书”、“黄皮书”成为那个特殊年代许多青年记忆中少有的亮色。^{[18](P68~69)[19](P274)}

三

综合各种材料可以看到,“文革”期间“灰皮书”、“黄皮书”向社会流散和传播的渠道主要有五个。一

是抄家。1966年夏秋大规模抄家过程中,很多红卫兵“小将”看到这些只闻其名、从未谋面的“内部书”动了“私心杂念”,私下带回来传看。“文革”发生的时候,作家韩少功在长沙读初中,在他的记忆中,“红卫兵”抄家的时候看到“好书”都要争抢,特别是各种难得一见的“禁书”更是争抢的“热门儿货”^{[20](P563)}。二是偷窃。失学在家的青春期孩子们想方设法进入已经封闭的学校或公共图书馆偷书,一部分“灰皮书”、“黄皮书”流散出来。“文革”发生时,学者朱正琳正在贵阳读中专,他和几个要好朋友整天混在一起,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在各大中学校的图书馆偷书,然后像饿者扑食一般沉浸在书的世界。“前南斯拉夫修正主义言论资料汇编”、写纳粹德国历史的《第三帝国的兴亡》等让他们眼花缭乱,几年之间,他们的“地下书库”居然有三千多册之多。^{[21](P165)}三是交换。高中级干部或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藏书丰富,他们的子女经常与同学、好朋友交换阅读各自家庭的藏书。韩少功记忆中的“换书”,还包括用各种时尚物品,如质地优良、设计新颖的毛主席像章、军帽、四个兜的军衣、上海牌白色回力鞋、三极管收音机、双面胶乒乓球拍等,交换自己喜爱的图书。四是购买。有私下、公开两种购买情形。前者是指抄家之风严重时,很多干部家庭为了避祸,把包含“灰皮书”、“黄皮书”在内的“涉嫌”图书大量送往废品收购站,喜欢“内部书”的学生们按照一公斤0.26元的市价收购^[3],魏光奇那时读过的“灰皮书”大部分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的^[10]。后者是指乔装改扮,拿着假造的介绍信到“内部书店”购买“内部书”,知青时代的朱学勤、韩少功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20](P563)[22]}。五是手抄或翻印。“文革”时期传抄盛行^[23],表达自我意识的诗作、心得可以手抄,离奇惊叹的小说可以传抄,那些极富思想魅力的“灰皮书”、“黄皮书”当然也可以手抄或油印。魏光奇最早见到的《新阶级》就是一个并不完整的手抄本,韩少功插队时见到过外地来访知青留下的一个油印本《新阶级》^{[10][20](P563)}。此外,知青之间频繁的通信联系交流读书心得,村与村之间的串村互访聚会交谈,也有传播“灰皮书”、“黄皮书”的作用。70年代前期,上海市图书馆按照上级指示曾一度开放过考茨基、伯恩斯坦和德热拉斯的部分著作^[24],这虽是个案,也可以知道那时还有这样一种流传“灰皮书”、“黄皮书”的情形。

四

无论是高中级干部家庭的子弟,还是平民家庭

的青年,他们读小学到中学的1950、60年代接受的完全是传统正面教育,接触“灰皮书”、“黄皮书”的时候大都处于青春期,一开始他们或许并没有什么其他政治观念(如果有,更多的还是正统观念),只是喜欢文学、艺术或政治、哲学,追求“人的自由”,有青春期的反叛,还有对现代意识的模仿,他们自由阅读并相互交流,渐渐形成独立思考和价值判断的基础。这个过程中,“灰皮书”、“黄皮书”对培育那一代人独立探索精神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至少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第一,破除了“个人迷信”和“领袖崇拜”心理,促进了独立思考、理性精神和民主思想的形成。“灰皮书”揭示了斯大林体制下苏联社会的专制、黑暗和残暴,这些“稀缺信息”让那时的青年“眼睛大睁呼吸急促”,足以产生到底“什么是社会主义”的思考;“黄皮书”传递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家对人的尊严与生命的描述,让很多知青“头脑里原来的禁区和桎梏慢慢地坍塌了”。联系我国反右、“大跃进”后社会现实,有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绝对权威”以及有没有不能再发展的“顶峰”、我国批判苏联是“修正主义”也同时被苏联批为“教条主义”到底谁对谁错等问题^{[25][26]}持续蔓延开来,逐渐汇集成一条条思想解放的潜流,匍匐在厚重的坚冰之下,绵绵流淌,等待春暖花开。

第二,加剧了对“文革”理论的怀疑,实际上否定“文革”的实践。《新阶级》指出苏联模式社会主义是东方落后国家以集权方式完成工业化的一种过渡状态,这个过渡状态照旧属于阶级社会,存在着“官僚

阶级”的压迫,存在着工人阶级的反抗等观点,让很多青年茅塞顿开。农村经济的残破和农民生存的艰难让知青在实践中感受到“新民主主义阶段论”符合1949年以后中国的实际,自然就要追问“大寨的道路对不对”并产生“中国不搞市场经济一定无法发展”等看法。许多青年藉此“打开一扇通向世界的窗户”,所获得的信息对“在暗中摸索的年轻人来说是多么激动人心,那是一种精神上的导游,给予我们梦想的能力”^{[18](P69)}。“思想的闪电一旦照进人们荒芜的心田,必将迸发出无穷的力量”。这些思想交汇聚集,成为1976年“四五”运动和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的思想共识与民意基础。

第三,强化了一代人的家国情怀和担当意识,进而凝聚成为国家转型前进的厚重支撑力量。散布在“广阔天地”的知识青年忍受着物质方面的艰难困苦,借助“灰皮书”、“黄皮书”的启发和引导,“在边村油灯下摆弄未知的国家棋局”^{[27](P78)},隐隐地关注国家命运与前途,讨论民族的苦难和成长,“以非知识分子的身份激烈辩论在正常年代通常是由知识分子讨论的那些问题”^[16]。在1980年代末开启的我国改革开放洪流中,这些思想深处深深镌刻了忧患意识的知青们依然抱定青少年时代形成的与时代共奋进的曲衷,把在窑洞里、竹林旁、雪山下、草原上就开始的思索延伸到大学课堂、创业战场,延伸到美利坚、欧罗巴,依靠已经浸入他们性格深处的勤奋、坚韧和创造,在为改变个人命运的打拼中,释放出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担当情怀,成为推动国家转型前行的厚重支撑力量,今天,他们中的佼佼者依然为国家和社会倾尽心智,演绎着年轻时代就深深积蓄的“苦难辉煌”。

注 释:

- ① 许多人认为“黄皮书”是“文学作品”(参见陈原《人·岁月·生活》,《界外人语》,商务印书馆,2000年12月,第6页;李琴《“黄皮书”出版的政治文化语境》,《中国现代文学丛刊》,2010年第1期,等),此说不确。当年在中宣部出版处担任副处长、亲身参与“灰皮书”、“黄皮书”出版工作的老出版家许立以认为“灰皮书”为“列入老修正主义者、机会主义者的著作”,“黄皮书”为“列入现代修正主义者著作”,“后来又增加外国文学方面的选题”(许立以《春天的脚步——许立以回忆录》,华龄出版社,2012年2月第319页)。
- ② “文革”前对“灰皮书”、“黄皮书”的购买控制较为严格,党内高中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凭单位介绍信办理“内部购书证”,可以到新华书店附设的“内部书店”选购“内部书”。“新中国成立后,行政级别达到十三级以上的被称为高级干部”(人民日报社《思想理论动态参阅》2014年第5期,第46页)。据中组部老干

- 部局、劳动人事部老干部局编印《老干部工作文件选编》(1983年9月,内部文件),十三级为司局(地专)级。北京的高级干部人数众多,管理从严,“副部长级以上”方可办理“内部购书证”(《四十历程》,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2月,第129页)。陕西规定行政十三级以上可以办理“内部购书证”(葛岩《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万象》2007年第3期)。
- ③ 1949年以后的中国城市发展中,党、政、军、文化教育和国企等单位都“占地筑墙”,集中修建了各自的家属居住区,“具备各种生活服务设施”,“相对封闭”,形成了一个“大院”。“大院”“俨然是一个自行运转的小社会”,并形成有别于传统街巷、胡同的“大院文化”。参见叶维丽《动荡的青春: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叶维丽、马笑东对谈录》,新华出版社,2008年8月,第52—59页。葛岩《七十年代:记忆中的西安地下读书活动》,《万象》2007年第3期。

④ 遇罗克发表《出身论》的署名也是“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中学文革报》创刊号,1967年1月18日),虽有夸大之嫌,

也可见那时各种“小组”之多。

参考文献:

[1] 张惠卿. 国际反修斗争和“灰皮书”[J]. 炎黄春秋, 2009(9).

[2] 杨建. 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1968年秋—1971年秋)[J]. 中国青年研究, 1996(2)(3)(4).

[3] 周华蕾. “地下读书沙龙”的秘密[J]. 中国新闻周刊, 2009(35).

[4] 汪剑钊. 中俄文字之交: 俄苏文学与二十世纪中国新文学[C]. 桂林: 漓江出版社, 1999.

[5] 徐浩渊. 诗样年华[A]. 北岛, 李陀. 七十年代[Z].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6] 柏桦. 始于1979——比冰和铁更刺人心肠的欢乐[A]. 北岛, 李陀. 七十年代[Z].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7] 徐友渔. 一群思想者的风貌和踪迹[J]. 中国青年研究, 1996(2).

[8] 刘仰东. 红底金字: 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5.

[9] 陈翰伯. 为少年儿童出版更多更好的课外读物[A]. 陈翰伯出版文集[Z]. 北京: 中国书籍出版社, 1995.

[10] 魏光奇. “文革”时期读书生活漫忆[J].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3 增刊.

[11] 叶维丽. 动荡的青春: 红色大院的女儿们——叶维丽、马笑东对话录[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2008.

[12] 政协宜川县委员会. 悠悠壶口情——北京知青在宜川[Z].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3.

[13] 张欢. 秦晓: 走出乌托邦[J]. 南方人物周刊, 2011, (15).

[14] 定宜庄. 中国知青史初澜[C].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9.

[15] 阳敏. 寻找我们的“达芬奇时代”——对话张木生[J]. 南风窗, 2006(8).

[16] 朱学勤. 思想史上的失踪者[J]. 读书, 1995(10).

[17] 萧萧. 《书的轨迹: 一部精神阅读史》[A]; 周舵. 当年最好的朋友[A]. 廖亦武. 沉沦的圣殿[Z]. 乌鲁木齐: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1999.

[18] 查建英. 八十年代: 访谈录[Z]. 北京: 三联书店, 2006.

[19] 陈丹燕. 白皮书时代的往事[A]. 上海的风花雪月[C].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8.

[20] 韩少功. 漫长的假期[A]. 北岛, 李陀. 七十年代[Z].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21] 朱正琳. 让思想冲破牢笼——我的七十年代三段论[A]. 北岛, 李陀. 七十年代[Z].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22] 朱学勤. “娘希匹”与“省军级”——“文革”读书记[J]. 上海文学, 1999(4).

[23] 赵杰兵. 康庄往事: 一位北京知青的记忆[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4.

[24] 吴亮. 我的罗陀斯: 上海七十年代[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1.

[25] 翟国胜. 郭世英在黄泛区[J]. 党史博览, 2001(8).

[26] 陈超. “X小组”和“太阳纵队”: 三位先驱诗人——郭世英、张鹤慈、张朗朗其人其诗[J]. 当代作家评论, 2007(6).

[27] 陈丹青. 幸亏年轻——回想七十年代[A]. 北岛, 李陀. 七十年代[Z]. 北京: 三联书店, 2009.

The gray and yellow books before the intellectual youths going to the country

ZHENG Rui-jun

(School of History,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e gray and yellow books refer to 300 types of domestically published books for over 20 years beginning in 1960s as negative coursebooks for the Party members to counter the global revisionism. The books spread after the start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mong the youths, providing for them with enlightening reflections. Later they become pioneers to drive China towards reform and opening as the campaign of the intellectual youths go to the country nationwide.

Key words: gray book; yellow book; underground reading; enlightening

[责任编辑 程 慧]